

醜陋的老三屆

文/ 劉雙

去年的夏天，一群“老三屆”在某歌廳聚會。一好事者將聚會錄影。之後，這盤錄影帶就在與會者中間流傳。某女士和她的女兒在家中一起看這盤錄影帶。沒看幾分鐘，女兒就發表了結論性的評論：“這群人怎麼一個兒一個兒的都那麼醜陋呀。”此話傳入筆者耳中，沉思多日，故寫此文。

一。“老三屆”的基本評價。“老三屆”是指 1966 年“文革”爆發時在校的三屆高中學生和三屆初中學生。其中年齡最大的是 66 屆的高三畢業生，俗稱“老高三”。“文革”風雨襲來之時，他們正逢高考即將來臨之際。如果那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晚三個月發動，“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將會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門。一場風雨，十年光陰，人生的道路由此轉向。“老三屆”中年紀最小的是 68 屆初中畢業生。他們於 1965 年跨入中學校門，1966 年 6 月停課時年僅 14 歲，尚未讀完初中一年級的全部課程。“文革”中，他們在荒廢了兩年的學業之後，也頭戴“知識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車。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 32 年。“老三屆”中大的已年過半百，小的也有四十六七。在當今少男少女的眼中焉能不老，焉能不醜呢？其實，“老三屆”們自己在相互審視時也會有同感。幾年前，一男“老三屆”曾約會一女“老三屆”，想重溫一次少年時代的同桌夢。男人留給女人的印像如何不得而知，而那女人衰老的容顏著實讓那男人傷感了許久。

世間萬物由鮮活走向衰敗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保爾·柯察金¹的那段名言曾經激勵過多少“老三屆”。一個人在回首往事的時候，只要自覺沒有碌碌無為，虛度年華就不會懊悔。作為一個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時，能夠在記憶的長河中採到一朵浪花，讓它閃現出往日的明媚和鮮豔就可以自慰平生了。而“老三屆”卻真的難說曾經擁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屬於自己的，浪漫無邪的青春時代。“老三屆”的青春時代是在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運動中度過的。“胡為”、“無為”、“虛度”、“懊悔”應該成為“老三屆”人生回憶錄中的關鍵詞。

80 年代初，“老三屆”陸續從農村返城之後，作為一個共命運的社會群體已不復存在。他們消融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和社會的各行各業之中。二十年又過去了，“老三屆”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現象。“老三屆”的故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文學作品和影視節目中。“老三屆”自己的回憶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多。藝術的再創作，失真的回憶和人為的粉飾把歷史上的“老三屆”搞得面目全非。不斷深化的對“文革”的否定的認識應該導致對“老三屆”歷史形象的重新復位。

一位有著四十年教齡的中學老教師曾經在一次家長會上說過，在她教過的所有學生中，“老三屆”孩子的綜合素質是最差的。這位老師談的是她的學生，但她無意中涉及了孩子們的家長——“老三屆”的整體素質的評價這樣一個敏感的話題。直率地講，就整體而言，“老三屆”是一個不但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其大多數也沒有接受過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個

¹保爾·柯察金：前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人翁。

群體。這一代人的群體素質低於他們的父輩，也不如他們的孩子們。在“文革”中，雖然有一些人也去上過三兩年“工農兵”大學²，可是，那種被“四人幫”推崇的“革命化”大學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眾所周知的。在 1977 年，1978 年類似安慰賽的高考中，“老三屆”中的一些幸運兒也曾金榜提名得到深造的機會，他們激動的心情不亞於農民土改期間分到土地時的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數字統計 77 級、78 級入學新生為 67 萬人。而這 67 萬人中有多少“老三屆”呢？最樂觀的估計不會超過 10 萬人。而“老三屆”的總人數大約為一千五百萬人。這 1500 比 1 的比值說明，77、78 年的高考確實改變了極少數幸運兒的命運，也將國家的教育體制引入正軌。但是，正是在這種所謂的“平等競爭”的考試遊戲中，在中榜舉子的感恩戴德聲中，國家欠下的中斷文化教育的孽債被名正言順地一筆勾銷了。而在那些為數可憐的幸運兒中，對知識的渴求已不再是學習的第一目的，人數不乏地表現出來的是對獲得一紙文憑的滿足和對可以名正言順地混入知識分子行列的竊竊之喜。而那些浪跡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學讀書作為進入官場的敲門磚的人確也不在少數。即使有個別人經過個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絕對改變不了“老三屆”作為一代人由於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齡又相對偏大，在各個領域裡競爭無力，即將過早地被社會淘汰的必然命運。在最近幾年的下崗大潮中，“老三屆”已是首當其衝。

二。醜陋的“上山下鄉”運動。醜陋的青春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屆”在北京搞過一個以“上山下鄉”為背景，以北大荒農墾生活為素材的攝影展。影展好像喚做“魂系黑土地”，主題辭是“青春無悔”之類字眼。（注意：計算機只能從硬盤字庫中調出“蕪穢”“污穢”“誤會”等詞組。“無”“悔”兩字只能分別輸入）但是，一個思維健全，心態正常的人看過影展後都不會留下美好、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蓬頭垢面，龜頭鼠臉，神情和目光都很呆滯。要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謂；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意欲何為。他們的服飾也無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的很。照片上作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驢棚，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麼的。不知影展的舉辦人想向來觀者展示和說明些什麼？這兩年，這類照片又被匯集成冊，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於世。那樣的生活值得炫耀嗎？1969 年夏天，人類的使者在全人類的目光的注視下登上了月球³。他緩緩地轉過身來，用驚異的目光眺望人類的故鄉——太陽系中一個唯一的，蔚藍色的星球。它浮動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發出摯愛的光和熱。在這全世界都意識到“科技凌駕於一切的時刻”，中國的“老三屆”們被剝奪了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權利，正在把自己可貴的，屬於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無奈地拋灑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還會有人去崇尚和再現這種醜陋的青春模式嗎？

別人如何評價“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個旁觀者的權利。“老三屆”自己對“上山下鄉”運動給自己和國家帶來的無可彌補的損失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了。

“上山下鄉”運動是應該全盤否定，徹底否定的！這並不是一個具有多麼高深的理論而需要研討的命題。“四人幫”倒台之後，國家默許千百萬以“老三屆”為主體的“知識青年”以高考、病退，困退等各種藉口倒流城市，並停止強迫初中和高中畢業生去“上山下鄉”的做法，以及在改革開放以後開始的，持續了 20 年的，恰恰是與“上山下鄉”逆向的“打工潮”都從實踐上否定了“上山下鄉”運動。

² “工農兵”大學生：從 1970 年到 1976 年入學的大學生。他們入學是由基層推薦而不必經過考試。

³ 1969 年 7 月 21 日美國“阿波羅”號在月球登陸。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等登上月球。

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工業人口與農業人口的比值，城市人口和鄉村人口的比值是標誌一個國家工業化程度和現代化程度的一個重要的參數。如果一個國家的農村人口絕對地大於城市人口時，這個國家是無現代文明可言的。“上山下鄉”運動人為地將本來在全民總數中就佔少數的城市居民驅趕到農村，將發展工業所必須具備的預備人員強制性地轉為務農人員。這種國策是與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是相違抗的。是一種倒退。

“消滅三大差別！”是“上山下鄉”運動中被喊得最響的口號。以“上山下鄉”為手段去減少城市人口以消滅城鄉差別；以減少腦力勞動人員的數量去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做法是農業烏托邦主義在 20 世紀最荒誕的實踐，其後果只能是社會的蛻變。拉大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

“與工農相結合！”也是一個被喊得震天價響的口號。純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的一個階級。而農民落後，自私，目光短淺。為什麼不留在城市裡去和工人階級相結合或者乾脆讓自己就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而要去農村和一個相對落後的階級相結合呢？實踐和理論是自相矛盾的，它只能用來騙人，根本不能自圓其說的。

20 多年以前，有人寫過一首歌頌“文革”，讚美“上山下鄉”運動的無恥長詩《理想之歌》⁴。1976 年 1 月它作為回擊“右傾翻案風”的砲彈，被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想是得到了姚文元的賞識和認同。據說此詩也是出自“老三屆”之手。受到了一點賀敬之詩歌風格的影響，詩人的創作更像是在模仿。雖同屬奉命文學，但它卻少了些《雷鋒之歌》的神韻，也不如《三門峽梳妝台》⁵來得流暢。紅衛兵文字的影響更是流露在字裡行間，可又缺了點兒紅衛兵文字中固有的傲氣與霸氣。總之很蹩腳，不倫不類的，像個四不像。詩中讚美理想的聲音就像是癡人說夢，在當時就為很多人所不齒。它和後來成為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另一位“老三屆”當年寫下的朦朧詩的開山之作《相信未來》⁶「6」相比，顯得那麼冗長，那麼做作，那麼另人厭惡。

有人說“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這位氣質浪漫的領袖在中南海的書房裡構思了稱之為‘再教育’的革命性創舉”。但是，認真考察“上山下鄉”運動發生的時代背景，其決策的動因中到底有多少理想主義的成份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醜陋的動因在“文革”中，因黨內政治鬥爭的需要，無理中斷國民文化教育和開展“上山下鄉”運動是一件事情的互為因果的兩個階段。

1949 年以後，政治運動不斷。而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且和學生有牽涉的只有兩次：一次是 1957 年的反右派鬥爭，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五

⁴ 《理想之歌》：刊登在 1974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詩集《理想之歌》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期又被 1976 年 1 月 25 日的《人民日報》轉載，作為回擊“翻案風”的有力武器，並加“編者按”全文如下：“《理想之歌》是北京大學中文系部分工農兵學員一九七四年集體創作的政治抒情詩。它反映了廣大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和教育革命中鍛煉成長的精神風貌。在當前教育戰線大辯論中，清華、北大等院校的同志一再朗誦、閱讀這首朝氣蓬勃、激情洋溢的詩。這說明，它符合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勝利成果這一鬥爭需要。本報刊登這首詩，以供更多同志閱讀，並用以回擊教育界右傾翻案風，批駁那種攻擊工農兵學員‘質量低’之類的奇談怪論。”

⁵ 《雷鋒之歌》：賀敬之的長詩，發表於 1964 年。《三門峽梳妝台》：賀敬之的詩。發表於 50 年代後期。

⁶ 《相信未來》：創作於 1967 年，作者郭路生。這首詩被認為“朦朧詩”的開山之作。

七年的反右鬥爭中有 55 萬人被打成右派，但運動沒有在中學生中進行，那實在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而“文革”到來之時，中學生就在劫難逃了，千百萬“老三屆”成為這場鬥爭的殉葬品。

“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波一開始就波及到中學。失控的校園再也聽不到朗朗的讀書聲。在即的 1966 年夏季的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此惡端一開，中學的停課狀態持續了多年，全國高等院校被關閉達 11 年之久。（如果以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為限，高等院校被關閉的時間也有七年之久）荒廢學業的中學生何止千百萬。

廢科舉，辦學校是中國人在本世紀初作出的全民族的選擇。從梁啟超、嚴復倡辦京師大學堂為起點，無論天災人禍如何慘烈，作為立國之本的國民文化教育就從來沒有中斷過。就是在決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戰爭時期，國民的文化教育也沒有間斷。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流亡大學為中華民族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棟樑之材。“文革”在這個層面上的確名副其實地成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年代。子不教，父之過。民不教，誰之罪？今天，“文革”中斷教育的後果早已顯現出來了。除了官場和商場，幾乎各種行業都存在著人才的斷層現象，其中，科技、教育領域的這種危機尤為明顯。當“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開始逐年成批地退休，離開科研，教育第一線的時候，作為一代人，“老三屆”不能挑起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歷史重擔。歷史也不得不無情地跨過“老三屆”，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輕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興國”的今天，應該清一清這沒有償還的歷史的舊帳。

文化教育停止了。但中國人的生育沒有停止，嬰兒們仍在出生，孩子們還在長大。“文革”搞了兩年，形勢雖然“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一個極為嚴峻的社會問題日益緊迫地擺在中國領導人的面前：1966 年“文革”開始時，五、六、七歲的孩子已經長到七、八、九歲，還遲遲不能跨入小學的校門。而“文革”開始時的在校的六屆小學生也停課兩年，仍被滯留在小學校園內。其中後來被稱為 69 屆、70 屆和 71 屆初中畢業生的孩子們也由於國家教育體系的崩潰一直無法完成小學的全部學業和正常地升入初中。讓三屆，上千萬適齡和超齡兒童同時進入小學校園的前提是：必須保證滯留在小學的三屆高年級學生要同時離開校園。理由很簡單：小學的校園和校舍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納如此之多的學生。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中學。而“老三屆”的運氣就沒有那麼好了。當 69 屆，70 屆和 71 屆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們像潮水般地湧進中學校門的時候，“老三屆”的學生卻不能按照上述模式處理，順理成章地升入高中和大學。當時的大學正在進行“鬥，批，改”，偉大領袖還沒有下“理工科大學還是要辦的”決心。而取締文科大學好像勢在必行。既然是這樣，“老三屆”便處在一個下端擠壓，上端封蓋的尷尬境地。他們就像多餘的環節注定要從社會的鏈條中被摘除去了。帶著一顆精神世界一貧如洗的頭腦和一個沒有完全發育成熟而顯單薄的身體，過早地離開校園，被拋向社會。如何處置“老三屆”呢？讓他們在城裡就業上班嗎？正在進行著的“文化大革命”擾得各行各業不能正常運作，很多企業都處在開工不足和停工狀態，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高中畢業生。可供“老三屆”走的路只有一條：離開城市。

當“老三屆”響應“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放下書本，離開書桌，走出教室時候，他們是義無反顧、責無旁貸的。甚至他們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也解釋不清楚當年他們投入那麼巨大的熱情去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到底是什麼東西。

歷史沒有嘉獎他們的無私，而是冷漠地嘲諷了他們的無知。他們的無知甚至使他們無從察覺自己已經被淘汰出局。與以往的右派下鄉勞動改造不同：右派們在運動後期被趕向農村的時候，頭上都帶著刻有 A 字的政治帽子，而“老三屆”被送往農村的時候卻身披“知識青年”的聖袍如同皇帝的新裝。當他們像廢棄物一樣被扔到垃圾堆裡去的時候，他們還堅信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醜陋的“自覺者”

“老三屆”不愧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他們中的傑出人物總能夠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自覺地湧現出來，想黨之所想，急領袖之所急。只用“譁眾取寵”四個字來解釋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不盡然。這是教育的結果。說得玄乎一點，這也可以算作是政治上的心靈感應吧。用正統語言來描述，這是有黨性的表現。

1966 年 6 月初，“文革”熱浪已經波及到了平靜的中學校園。“老三屆”被滾燙的政治氣候熏烤得坐立不安。參與意識，表現意識已經成為一種自覺意識。6 月 13 日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說為了徹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決定當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因為需要有一定的時間來研究和製訂新的招生辦法。6 月 18 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中央和國務院的通知的同時轉發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同學以班集體的名義給黨中央毛主席寫的信⁷，她們在信中強烈要求停課鬧革命，並自願放棄已經迫近的高考。她們將高考與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相提並論，高呼要砸爛舊的升學制度。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學致毛主席的信和寫給全北京市師生的倡議書也同時被刊登在那一天的《人民日報》上，他們用更狂熱的語言表達了“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的願望，並發誓：“誓作社會主義的工農兵，決不當資產階級的大學生”。幾乎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老高三”中都出現了類似的言行。上海 61 中高三（三）班的同學貼出大字報，長沙一中高三（三）班團支部致信團中央，他們都在控訴舊升學制度的罪惡，都要求取締舊的升學考試制度。取消高考，中斷國民教育這樣傷天害理的事情是不便由國家出面直接倡導的。打民意牌，可以把少數高中生由於頭腦發昏表達出的非理性的願望強加在幾十萬“老高三”畢業生的頭上。本文作者並不想過多地指責當年寫信的同學，他們也負不起誤人子弟，危害國家的責任。他們捨棄了自己桃李芬芳，歡歌一堂的時光，就以為擔負起了天下的興亡；他們過早地、盲目地進行了選擇，可撲面而來的卻是不斷增長著的民族內耗的滔天濁浪。實際上，有沒有這樣一些信出現，“老三屆”的結局都是一樣的，一場摧枝落蕾的桃李劫是注定要降臨的。應該反省的是：“老三屆”作為一代人，在被剝奪學習文化知識的基本權利的歷史性時刻，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整體性的麻木。雖然個別人有一些反應，也不過是不健全的政治神經的抽搐而已。這是社會的文化虛無主義在“老三屆”身上結出的，必須由“老三屆”自己來吞嚥的惡果。

教育停止了，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被堵死了。渾渾噩噩的初中生整天陶醉於革命和造反，廢寢忘食地忙碌著。而高中生，尤其是年齡已過 20 歲的“老高三”的學生已經開始考慮人生的走向。選擇的餘地很小，絕大多數人對未來感到渺茫。但是，也有極少數“冷靜者”在

⁷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信刊登在 1966 年 6 月 18 日的《人民日報》上。

那昏熱的年代，憑藉青年人不應有的社會經驗和政治敏感為自己找到了一條曲線遷升的道路。

1967年的秋天，中學的“文革”還在轟轟烈烈地進行著。“老三屆”的去留問題尚未提到日程上來。北京的“老三屆”中有“十男十女”（“老高三”的居多）⁸不知是因為想逃離政治鬥爭的漩渦還是想尋找新的興奮點，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莊嚴誓師，然後奔赴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內蒙古大草原紮根落戶。這“十男十女”頗具浪漫主義的舉動如同前文提到的女一中高三（4）班的那封信一樣，引起國家的高層的注意，輿論工具廣為宣傳，一時風頭出盡。他們的舉動為高層處置“老三屆”提供了一條新思路。一年以後，1968年12月22日偉大領袖終於發出了“上山下鄉”的號令。與那先知先覺的“十男十女”自願去草原的情況不同，“上山下鄉”從此成為一項強制性的政策。

當年火車站送別的歌聲、喊聲和哭聲早已飄散。落戶農村的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也早已作鳥獸散。那“十男十女”可能是最先捲鋪蓋卷返城的一夥人。當年的“模範帶頭”作用早已成為他們仕途上的一塊墊腳石。“堅決同貧下中農相結合，永遠紮根農村邊疆！”的誓言像一聲響亮的臭屁，放過之後就無聲無味了。和許多“模範知青”（比如蔡立堅）相比，他們的誓言要廉價的多。70年代末期，“老三屆”的返城大潮不可逆轉，歷經十年的“上山下鄉”運動終於落潮了。卻有近百名有全國影響的“知青”聯名發出了“堅決紮根農村六十年”的最後一聲狂吠，理念之迷亂，時務之不識，冥頑之不化已達到喪心病狂的程度。中國是一個無神論佔統治地位的國度。發誓很隨便，背叛自己的誓言也很隨便。誰也不會因不遵守自己的誓言而遭報應。但是，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在這種善於政治投機的人的靈魂深處總有一塊陰暗的地方，陽光照射不到，只好一直糜爛下去了。

醜陋的實踐。

1965年9月25日的《中國青年報》說，從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間，全國有一百萬知識青年落戶農村。十年以後，1975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輝煌勝利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為標題，向世人宣布：自1968年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偉大號召以來，七年的時間裡已有“一千二百萬知識青年光榮務農”。“文革”前後，全國平均每年下鄉的“知識青年”人數從十萬激增到一百七十萬。在造成這種大規模地將城市青年驅趕到農村去的諸多原因中有三條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教育事業的停滯甚至倒退；工業發展的相對緩慢；解放以後無節制地被生育出來的人即“老三屆”及其弟妹進入了被迫就業的年齡段。

“上山下鄉”運動起源於50年代中期。作為一種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它興起在60年代初期。“文革”前夕“上山下鄉”政策帶來的社會弊病已經顯露出來。老一代的“知青”為了自己的生存權向社會作出過強烈的反應。“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潮的影響和“老三屆”在“上山下鄉”運動面前表現出來的愚昧，尤其是國家製定的鐵打的“上山下鄉”政策使得“老知青”用青春和血汗換來的教訓和全部爭取人權的努力付之東流。

⁸ “十男十女”去內蒙牧區插隊的消息刊登在1967年10月11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上，標題是：“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走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北京一些革命小將自願到內蒙當普通社員”。

然而，在“上山下鄉”運動的十年中，“知識青年”始終是社會的一個不安定因素。而這種不安定首先來自“知識青年”的內心。許多“知青”的回憶錄中連這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都不敢承認。虛偽是“老三屆”群體品格中最顯著的品德之一，由此可見。正像“文革”以前，很多“老三屆”背上糞桶去掏糞，噁心的回家後連飯都吃不下去，可是卻在入黨，入團申請書上大談特談自己的心靈是怎樣被屎尿之液洗淨了一樣。

雖然“知識青年”的文化程度和廣大的農民及其子弟相差無幾，可是，一種因為自己是來自城市而產生的優越感使他們的絕大多數從內心深處看不起農民，也看不起農民的孩子們。就是那些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城市貧民的子弟在農民面前也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在三十年後“老三屆”撰寫的“上山下鄉”回憶錄中隨處可見，雖然他們也承認得到過來自農民的厚愛。“老三屆”和更老一代的回鄉“知識青年”例如邢燕子，董加耕相比，缺少的是樸實與忠厚以及對鄉親對土地的那種夢牽魂繞的鄉情。異化了的革命理想使他們的情感漂浮在半空中，無法升華又不甘沉落。春天，他們雖然和農民一起在田間播種，秋天，卻不能在和農民一道收穫時同時收穫喜悅。秋天是他們返回城市的季節。他們將在無聊和空虛中度過一個漫長的，城市的冬天。把自己失落的腳印留在城市陰冷的街道上，把自己迷茫的身影留在城市人憐憫的目光中。當春天再一次降臨的時候，他們只好又無奈地回到農村。年復一年，他們象“邊緣人”一樣遊蕩在城市和鄉村間。那種心不守舍，身魂兩地的精神狀態曾經那麼痛苦地折磨過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那種感覺應該是刻骨銘心的。但是，在許多“老三屆”寫的“上山下鄉”回憶錄中，這種落魄的感覺沒有被記錄下來。

想方設法離開農村，改變自己“知青”身份的活動是和“上山下鄉”運動幾乎同步進行著的。每一個有“知青”成員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把自己的孩子調離農村。如果有人願意考證一下“走後門”⁹一詞產生的時代背景，就會發現它與“上山下鄉”運動是密不可分的。權力對於看似平等的“知青”大軍的瓦解作用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在十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千千萬萬“知識青年”自發和自覺作的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抗拒被農民的同化和不惜一切代價返回城市。每逢升學，農轉工，調幹的機會，他們就會不擇手段：女的不惜出賣色相，男的不惜以死相要挾。他們希望離開農村和農場不僅僅是因為那裡有著太多的貧困和太多的愚昧，基層的惡勢力無時無刻不在啃噬著他們的青春。鄧賢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知青夢》¹⁰向人們再現了中國知青族被欺騙、被強姦、被虐待的生活場景，還原了一個絕望、渾噩、醜陋的群體形象。而在更多的“知青”回憶錄中，這醜陋的一切被掩飾的無影無踪。這種少數人的掩飾比起大多數人的沉默要可惡的多！是從肯定的意義上，把歷史悲劇幻化為正劇；還是在否定的意義上，把歷史的真相化為一場人生的悲劇，這是必須正視的。

發生在 1973 年的“張鐵生事件”¹¹已逐漸被世人淡忘。但是，在幾乎每一本“老三屆”編寫的以歌頌“上山下鄉”運動為主題思想的“知青”回憶錄中都可以找到指責張鐵生的文字，內

⁹ “走後門”：社會常用語。用於形容做事不經過正當渠道去辦，而是通過人情關係去完成。

¹⁰ 《中國知青夢》：是四川知青鄧賢以雲南知青生活為素材的長篇報告文學。

¹¹ “張鐵生”事件：在 1973 年招收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的考場上，遼寧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張鐵生在考卷上寫下了一段乞求上學的文字。這一事件被“四人幫”大肆渲染。刊登在 1973 年 7 月 19 日的《遼寧日報》上，後又被《人民日報》轉載。

容也如出一轍，說，要不是張鐵生，自己就可以上大學了，云云。今天，回首往事，應該為張鐵生說句公道話：他何罪之有？為什麼不去譴責無理中斷全民文化教育的決策者，而要嘲笑張鐵生是“白卷先生”？為什麼不去控訴將整整一代應該在學校讀書的青年人驅趕到農村邊疆的作法，而要去指責張鐵生是一個“大學迷”？張鐵生是“老初三”的學生，他沒有上過高中，初中畢業後，搞了兩年“革命”就去農村勞動，一幹就是五年，文化考試考成那個德性是再正常不過的了（物理和化學兩門只得了6分，數學61分，語文38分）。如果用那套卷子，在1973年對67屆、68屆、69屆和70屆的初中畢業生進行全國同試，多數人還考不到張鐵生這個水平，“白卷”大軍不會少於一千萬！幾乎所有的“老三屆”都讀過高玉寶的《我要讀書》。但是，當他們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的時候，卻沒有人站出來為自己，為自己所屬的一代人進行抗爭，絕大多數人都保持沉默。倒是張鐵生以他特殊的方式，用他的“答卷”向社會，向統治者發出了“我要讀書”的乞求聲。其相雖醜，其聲也悲呀。

紀念醜陋

前兩天從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為了紀念“上山下鄉”運動30週年，某公司準備發行金卡，數量三萬枚。雖然沒有消息證明有“老三屆”參與了這件事情。可除了“老三屆”還有誰會如此熱衷與這件事情呢。

凡是發生在歷史上的，值得後人紀念的事情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因為它的出現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一種是因為它的出現阻礙了社會的進步。

“五。四”運動對科學和民主的呼喚是本世紀中國青年最值得驕傲和最值得紀念的創為。而“上山下鄉”運動雖然涉及的人有上千萬，持續的時間達十年之久，但是，它背離了“五。四”精神，沒有給中國帶來絲毫的社會進步。有些自己感覺混得不錯的“老三屆”總是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方式粉飾“上山下鄉”運動，以證明自己的青春沒有虛度。他們有意或無意地虛構了一個可以欺騙自己孩子們的神話，一個中國拓荒者的神話。但是，從黑龍江的北大荒到雲南的西雙版納；從陝北的黃土高原到內蒙古的大草原，“老三屆”沒有開發出一處“輝煌的西部”，他們留下的只是一片片枯萎的橡膠林和因過份砍伐樹木形成的一座座光禿的山嶺，和被他們遺棄的，已經長大成人並和當地人沒有任何區別的親骨肉，還有那至今都難以啟齒的羞辱和痛苦。“上山下鄉”運動是十年浩劫的副產品。是“文革”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一個聲部。“文革”是國恥。國家之恥，國人之恥。“上山下鄉”運動則是中國青年的恥辱。如果一定要紀念的話，那就應該只是為了這曾經發生在共和國青年人身上的悲醜劇永不重演。

三。醜陋的紅衛兵運動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控訴文革的罪惡。好像在那場持續了十年的浩劫中只有四個人人在作壞事，而其餘十億減四的人都是受害者，都是無辜的，清白的。於是歷史上的“文革”失去了載體。但是，如果這個載體確實不曾存在的話，“文革”就根本不可能發生和發展。對“文革”的反省應該是全民族的。既包括執政黨也包括老百姓。“老三屆”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歷史卻沒有善待他們，他們也沒有善待歷史。“老三屆”在“文革”中有被欺騙和利用的一面，但是，主動迎合，積極參與卻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

看過電影《淮海戰役》的人都會記得毛澤東有這樣一段台詞：“60萬比80萬（解放軍和‘國軍’人數之比）……這是在賭國家的命運，賭民族的命運。‘啪’的一下押上去，就是那麼一回事。”在解放戰爭中，他老人家是勝利者，是贏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手中的“賭資”是什麼？最大的“賭資”當然是他在老百姓心中早已形成的，如日中天的崇高威望。但是，僅此一注是不夠的。無論輸贏，在各類碼子中，有一注是注定要輸進去的，這就是“老三屆”——他們的青春和前程。

醜陋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毒焰首先是在大學校園被點燃的。但是，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打壓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¹²發表後形成的轟轟烈烈的局面，很快變得冷冷清清。於是，毛澤東走出滴水洞，在暢遊了長江，回到北京之後，他作了兩件一反常態，驚駭全黨的事情。一是寫下了《炮打司令部》¹³的大字報，向全黨公開了他要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一是親筆給清華附中紅衛兵¹⁴寫回信，表明他老人家已經找到了一種讓政敵和同盟者都意想不到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可以由他任意號令，招之即來，揮之則去，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將中學生推向政治鬥爭的最前沿確實有著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效用。

中學生的年齡是從13歲到19歲。這是一個從身體發育到心理發育都尚未達到成熟的年齡段。青春的躁動、是非的無斷、理念的易變，再加上抖擻的精神和旺盛的精力都表明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年齡段。教育學和心理學都認為，中學生是需要特別加以引導和訓教的一群。英文中有一個特指處在這樣年齡段的人的專用名詞：teenager。它是由teen和age複合而成。可是，它決不是一個簡單的複合名詞，只在表徵處在該年齡段的青年的年齡特徵。更深層的內容在於涵指這個年齡段的人在教唆和誤導的情況下，他們的行為往往具有一種反復無常、喪失理性的傾向，因而是極端危險的。文革中的“老三屆”正是這樣一個群體。

歷史對“老三屆”的選擇看似偶然，但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建國十七年以來，以革命傳統和階級鬥爭為大背景的社會教育培育了“老三屆”以仇恨為底色的社會情感，“文化大革命”中，為了這種情感的宣洩中國人付出了血的代價。五七年以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批判和鬥爭愈演愈烈，全社會形成了一種對文化虛無主義的普遍認同。這種反文化的傾向對“老三屆”影響是極為可怕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封建主義的；西方的文化無論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都是資產階級的；五十年代還可以接受的前蘇聯和東歐的文化到了六十年代也成了修正主義的東西。“老三屆”的精神世界近乎一片荒漠。“文

¹² “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是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聶元梓1966年5月25日在北大校園貼出的攻擊校黨委的大字報。6月2日有毛澤東批准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後來，毛澤東將其稱為“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¹³ “炮打司令部”是毛澤東1966年8月5日寫下的一段文字。題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其中列數劉少奇的所謂“罪狀”，打倒劉少奇的決心盡顯其中。全文如下：“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反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¹⁴ 北京清華附中紅衛兵：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的若干幹部子弟在圓明園集會成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他們寫的三論《造反》的文章和毛澤東寫給他們的回信都被刊登在1966年第11期《紅旗》雜誌上。

革”前夕“老三屆”只能接受以《收租院》¹⁵為代表的控訴藝術和以《紅岩》¹⁶為代表的烈士文學。前者對“老三屆”的影響是將不同社會制度的比較轉變為對人的仇恨，後者是把信仰的追求轉變為對復仇的渴望。在不斷地、反復地對“人性論”進行批判的同時，“老三屆”接受了日益深化的個人崇拜教育。其中，學習雷鋒的運動¹⁷將個人崇拜的方式進行了推陳出新，學習毛主席著作也由此走上實用主義的道路，對毛澤東的神話莫過於在“老三屆”的心中。

從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開始全面抨擊黨在文化教育領域的方針政策。文化部被說成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宣部被喻為“閻王殿”；評價最低的是教育界——“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文革”前，“毛澤東和毛遠新的談話”、“毛澤東和王海容的談話”給“老三屆”的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混亂。這些以抨擊現行教育體制的講話一經流傳，不尊敬老師，不崇尚知識之風即刻成為一種時尚。“文革”前的《中國青年報》曾刊出過一篇嬉笑之文《獲取5分的“秘訣”》¹⁸，它的作者就是“文革”中的“老三屆”。這篇文章比黃帥小姑娘的日記要早了將近十年。把它算作是“老三屆”潑向自己老師的第一盆污水可能是不會有誤的。北京市東城區某校初一的學生在1966年初曾寫出一文，題目在當時就非常嚇人——《現在的學校培養不出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其矛頭還是對準了教育體制和老師。無論是對楊獻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學觀點的批判，還是對田漢的“有鬼無害”的戲劇理論的批判，“老三屆”都積極參與，表現出了極大的“革命熱情”。“文革”風雨未到，“老三屆”已經躍躍欲試。政治思想的“熱身”運動已經完成於無形之中。

“文革”中的“老三屆”是紅色的“teenager”。以紅衛兵為代表，以“八一八”為起點，“老三屆”呼嘯著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檢閱紅衛兵。在以後的四個月中，有一千萬以“老三屆”為主體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在這裡接受過他的檢閱。“八一八”是“文化大革命”這齣中華民族的悲醜劇拉開大幕的時刻。那紅色的古城樓就是一座歷史的舞台。無論以後如何，或壽終正寢、或橫屍荒野、或臘炬成灰、或面壁囚籠，劇中的主角都從幕後走向台前。劉少奇的尷尬，周恩來的矜持、江青的傲慢、康生的陰冷，尤其是林彪那白骨般的面容和他嘶聲力竭的呼喊，對中國人，對中華民族來說充滿著險象和凶兆。毛澤東在震耳欲聾的“萬歲”聲中舉起手，揮動著他手中的綠軍帽，而他的目光卻沒有投向在他腳下的芸芸眾生。端詳那張由攝影師留下的，記載著那歷史瞬間的照片，人們會發現：毛澤東微昂著他碩大的頭顱，把他冷漠的目光投向無際的蒼穹。與這神情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紅衛兵的狂熱，他們歡呼著、吶喊著走過天安門城樓，個人崇拜的狂濤巨浪席捲了天安門廣場。這種場面與1933年1月30日柏林的火炬之夜¹⁹何其相似。

¹⁵ 《收租院》：一組大型泥塑。以解放前四川大邑縣地主劉文采的莊園內的收租院向農民收租的情景為素材，塑造了一群受壓迫受剝削的窮苦農民的形象。

¹⁶ 《紅岩》：羅廣彬、楊益言的長篇小說，1962年出版。描寫國民黨特工人員殘害、屠殺共產黨犯人的故事。

¹⁷ “學習雷鋒”運動：1963年3月5號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由此開始了學習雷鋒的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有兩種潮流。一是倡導一種公而忘私、捨己為人的社會風氣；而另一種潮流是以林彪為代表的，提倡用實用主義的方法去學習毛澤東的著作。

¹⁸ 《獲取五分的秘訣》：刊登在1965年六月的《中國青年》雜誌上。

¹⁹ “火炬之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當選德國總理。納粹青年在柏林舉行火炬遊行。

紅衛兵不分男女，都身穿黃色的舊軍裝。不知是天太熱的緣故，還是故意要擺出這副樣子，每個人都捋胳膊挽袖子，刁蠻之像讓人兵痞難辯。男的是清一色的小平頭，女的多是超短髮，也有的女紅衛兵將自己剃成一個禿子以示革命。不知她們是怎樣將革命和消滅女性特徵聯繫在一起的。封建意識形態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帶有宗教色彩的禁慾主義傾向那麼自發地而又自然地毒害著少女的心身。如果當時可以做變性手術，這些女娃子們會毫不猶豫地躺到手術台上去的。站立時雙手插腰。說話時國罵不離口，本來沒有罵人習慣的人為了顯示自己已經不再溫良恭儉讓，也要在講話時生硬地帶出幾句“他媽的”來。走起路來乍著胳膊，像一隻隻橫行霸道的螃蟹。而遠遠望去又更像一片專門啃噬綠葉的蝗蟲。這是一股真正黃禍。它的肆虐雖然時間短暫，卻在中華民族的近代史上寫下了極其醜陋的一頁。

紅衛兵這個短命的怪胎一降生到這個世間就發出了兩聲驚世的怪叫：一聲是“造反有理”；一聲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醜陋的口號

其實，第一個講“造反有理”的是毛澤東本人。四十年代，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壽辰的大會上發言，其中說道：“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對科學共產主義的這種抽象是否科學、嚴謹是值得推敲的，即使是面對陝北的莊稼漢。二十年以後，在清華附中紅衛兵語無倫次，邏輯混亂的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中，“造反有理”四個字被重新詮釋。今天重讀三論《造反》，其立論之荒謬，論據之牽強，論述之無理當不必說。值得探討的是：文章的作者小小年紀，吃了十八九年的糧食，書只讀到中學，事還沒有作成一件，那裡來的如此了得的傲慢與囂張。他們貴為金枝玉葉，既沒有人壓迫他們，也沒有人剝削他們，到底有何反可造？

解放初期，有人曾告戒幹部子弟要以史為鑑，不要重蹈滿清八旗子弟²⁰的覆轍。這種告戒固然用心良苦。希望幹部子弟不要墮落當無可指責。但這種期望是以認定幹部子弟應當享有特權為前提的。事實上，這種特權從共和國建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著。在如何對待下一代的問題上，超越歷史的局限性，擺脫幾千年封建社會形成的帝業子承的世襲觀念，代之以天賦人權、平等競爭的思想，在那個年代是一種奢望。幹部子弟從小就意識到自己不同於平常百姓家的孩子。和八旗子弟一樣，他們是特權階層，是精神衙內。傲慢與偏見簡直就是與生俱來。沒有人敢於無視和怠慢這種驕狂。但是，“文革”的實踐證明，這種驕狂導致的行為比起他們的沉淪和頹廢給社會給國家所造成的後果要嚴重的多！幹部子弟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中生活條件最優越，政治待遇最特殊的一個群體。社會對他們的嬌慣養成了他們感情用事，為所欲為的性格。當“文革”來臨之時，他們本來有條件憑藉自己特殊的社會地位所獲得的便利去準確地揣摸領袖的用心所在，去理解“這場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句話淺顯的內涵，從而避免在這場以打倒自己父輩為第一目的的“革命”中的充當衝當衝鋒隊的角色。然而他們只是憑藉自己想象去理解甚至企圖左右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他們帶上紅衛兵的紅袖標，高喊“造反有理”的全部意圖就是要藉“文革”之機，向社會向人民索取更大更多的特權，使自己不但可以享有凌駕於同齡

²⁰ “八旗子弟”：滿清皇族分為八旗。正黃旗、正藍旗、正紅旗、正白旗、鑲黃旗、鑲藍旗、鑲紅旗和鑲白旗。他們的子弟統稱“八旗子弟”。“八旗子弟”在建立滿清王朝的過程中衝鋒陷陣，功勳卓著。入關後，吃喝玩樂，沉溺酒色，一蹶不振。

人而且享有凌駕於全體人民之上的權力和地位。毛澤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幹部子弟的這種驕狂。因為這種以無知和任性為特徵 65 的桀驁不遜不可能逃出忠君思想和個人崇拜的陰影。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大的阻力來自一個社會正常運作所必須具備的秩序和法統。按照黨章和憲法所規定的領導人產生和廢黜的程序，就無法打倒劉少奇和一大批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用貧民造反的模式可以置一切法規於不顧。但是現在的天下誰敢舉旗造反呢？地富反壞右不敢，知識分子不敢，工人農民也不敢。歷史選擇了紅衛兵。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信中，毛澤東肯定了“造反有理”的口號，使之成為“文革”中喊得最多，喊得最響的綱領性的口號。黨紀國法，倫理道德在這個口號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從此，造反的禍水流遍全國，運動也從“有序”走向“無序”。

但是，中學紅衛兵的失寵來得之快是連他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紅旗》雜誌十二期的評論員文章《紅衛兵讚》中曾高喊“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萬歲！”，可是，從“八一八”到《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²¹發表不足 100 天的時間，“小將們”就從輝煌的顛峰上滾落下來。少爺小姐們也曾為此鬧得烏煙瘴氣，雞飛狗跳，可是“造反有理”的接力棒還是不得不交給貧民出身的，與“走資派”沒有太多血緣關係的蒯大富和王大賓²²之輩。然而，屬於“老三屆”的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喊“造反有理”的口號，自覺地為這場浩劫推波助瀾的歷史“功勳”，堪稱醜陋之最，是應該被寫入史書的。

醜陋的對聯

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現代血統論的代表作。雖然譚力夫²³極力兜售此貨，但是它的主要市場不是在大學，而是在中學校園。身為兒女，人皆有父母。對聯的咄咄逼人在於沒有人可以逃避，也沒有人可以選擇。

現在還無從考證是誰，也沒有人出來表示自己應該享有對對聯的發明權。但它是“老三屆”的專利是不會有問題的。辛亥革命 55 年之後，如此荒唐的玩意兒在當時北京的每一所中學的校園裡隨處可見。封建主義的破爛貨能夠堂而皇之地登上社會主義正統思想的殿堂，究其根源，與中國沒有經歷過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有關，與以“自來紅”自稱的幹部子弟們在民主革命時期入黨的爺娘頭腦中還沒有得到改造的農民意識有關。

解放以後，滲入社會生活每一個角落的階級路線和以階級鬥爭為大背景的社會教育深刻地影響了“老三屆”。“文革”前夕，中學生之間已經沒有友誼可言，人性的失落已見端倪。在很多學校已經出現“出身好”的同學自覺地，有組織地排斥、打擊“出身不好”的同學的傾向。人為地挖掘階級的鴻溝，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的對象。“文革”的到來，“對聯”的出現，使上述情況惡性發展，最終演變成一場新種姓歧視的醜劇。

²¹ “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1966 年第十三期《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提出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表明劉少奇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

²² 蒯大富、王大賓：均為“文革”中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

²³ 譚力夫“文革”中北京工業大學學生。曾發表過鼓吹血統論的講話。

面對高懸的對聯，非“紅五類”（紅五類是指革命幹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貧下中農）子弟的人格和尊嚴喪失殆盡。革命的誘惑與血統的卑賤在扭曲他們的人性。有一個女孩把社會對她的歧視轉變成對母親的仇恨，在對母親拳打腳踢之後，勒令母親跪在地上，用剪刀剪去了她的全部頭髮。筆者的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學為了表明自己決心脫胎換骨的決心，不止一次地在對聯的辯論會上狂喊：“我就是一個混蛋！”行文至此，他那張無血色的小臉，不知所措的眼神又浮現在我的面前。我不敢想像他是如何縫合這精神的創傷的。恥辱莫過於精神的自殘。“文革”的醜惡可見一斑。

對聯的出現使青年人本應五光十色的理想被抽象為對革命的圖騰崇拜，而本應以解放全人類為最高境界的革命被轉變為對家庭出身的攀比和計較。有的學校高幹子弟雲集，紅衛兵組織將革命幹部的標準定為：行政級別 13 級以上，入黨時間在 38 年以前的人。於是，有一大批本來可以在人前顯貴的幹部子弟硬是被推入“職員子弟”的行列被搞得灰頭土臉。而那些根正苗紅，將別人斥責為“狗崽子”的“自來紅”們的好景也不長。最大的諷刺莫過於這些“自來紅”們的遲鈍使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場運動的矛頭所向正是他們日夜引以為自豪的老爹。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才發現自己正在完成一個被自己的邏輯所認定的，由“好漢”向“混蛋”的轉變。

“對聯”問世不久，“老三屆”中不是“混蛋”的人已寥若晨星，還真有點“池淺王八多”的味道。直到 1966 年 10 月，才因“對聯”的荒謬實在是顯而易見，才由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²⁴出面講了幾句無關痛癢的話。但是，血統論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毒化人們的生活。

遇羅克烈士²⁵因反對“對聯”，撰寫《出身論》而慘遭殺害。他倒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他的血濺在“老三屆”的身上、手上。遇羅克是中國 20 世紀後 50 年中出現的最勇敢，最傑出的思想者。他的絕筆“乾坤持重我頭輕”一定會流傳下去。但是他和他的詩不屬於“老三屆”。

今年是 11 屆三中全會召開 30 週年。三中全會的深遠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地為世人所認識。在紀念它的日子裡，人們似乎忽略了三中全會作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摘去全部地主、富農份子的帽子，稱他們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對與他們的子女來說，作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這個決定猶如“解放黑奴”的宣言。他們終於可以挺起胸、抬起頭和其他人一樣在共和國的同一片藍天下自由地呼吸。勒在上千萬“剝削階級”子女及其親屬頭上出身不好的“緊箍咒”被摘掉了。以“出身”界定人的優與劣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醜陋的作品

紅衛兵不但有自己的口號也有自己的作品以表達自己的好惡。

²⁴陳伯達講話：1966 年 10 月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所做的《對兩個月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總結》。其中有譴責“對聯”的言辭。

²⁵遇羅克：“文革”前畢業的高中畢業生。“文革”中撰寫多篇反對“對聯”的文章，最著名的是《出身論》。1970 年 3 月 5 日被北京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判處死刑。

32年前，紅衛兵自己創作的以宣傳造反精神為主題的歌曲簡直多如牛毛。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些強音悍調也漸漸地被人遺忘。可是，有一首歌笨拙的旋律還經常出現在影視節目中。《造反歌》是“老三屆”給歷史留下的又一“傑作”。它的詞曲作者不詳，但它的“誕生地”應該是北大附中。

“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
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所謂“黑幫”是1966年四、五月期間的《人民日報》對“三家村”²⁶的稱謂。後來被用來泛指所有被認為有必要被打倒的人。所謂“見閻王”就是奪人性命。不管“說黨不好”的人講得是否有道理，也不管是說黨在某一個方面或是在某一個時期作過不好的事情還是說黨在全局性的問題上有過不好的決策，總之，都要奪其性命。後來的事實證明，歌詞中的誓言並不只是一種意願的誇張表述，而是實際行動的寫照。其實，這種危言聳聽的提法並不是“老三屆”的發明。“老三屆”只不過是受到了林彪“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種講法的誘導，鸚鵡學舌罷了。在“老三屆”長大成人的歲月裡，法制教育是一個盲區。殺人奪命之事無需法律條文的認定，也不需要司法部門的核准，“文革”中他們就是這樣作的。詩言志，歌也言志。無論藝術性還是思想性同父輩的《畢業歌》相比，《造反歌》是敗筆。

中學紅衛兵的思維走向和他們的價值取向多是通過大字報和自己辦的報紙來表達的。他們貼出的大字報的數量是不可計數的，但是沒有留下記錄，除了少數極端作品，如《三論造反》之類。而紅衛兵辦的報紙刊物雖然屈指可數，但保存下來的數量卻很可觀。一張大字報的出現往往與作者的個人在寫作時的情緒有關而帶有隨機性，而報刊上的文章卻要經過一群人的討論比較能夠反映一個群體的意志。出現在北京的紅衛兵報紙有《湘江評論》《火星報》《萊茵報》²⁷等。這些報紙除了頑固地、不厭其煩地販賣“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狗皮膏藥之外，還有一個喋喋不休的宣傳主題，就是“鎮壓流氓”。紅衛兵對流氓的關注始於紅八月，而到了他們失勢以後，向人民群眾高喊一聲“鎮壓流氓”也可以使自己心態趨於平衡。任何一位政治家，任何一個有理念的政治派別都不會把鎮壓流氓看作是政治鬥爭中的一件什麼要緊的事情。更何況毛澤東。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鎮壓流氓”扯在一起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紅衛兵心目中的所謂流氓是指那些家境貧困，上不起學而又沒有固定工作的社會青年。紅衛兵對這些本應得到社會救助和同情的同齡人傾注了極大的仇恨看似難以理解，其實也很正常。說到底還是血統論——那個社會的新種姓歧視在作怪。

提到紅衛兵的刊物應該提一下1968年初出現在北京中學校園的油印刊物《準備》。

《準備》與人大附中的紅衛兵極端分子有關。北京紅衛兵與“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早在一年以前就顯露出水火不相容的態勢，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是“文革”中出現的第一支反江青的政治派別。但是，在讀過《準備》的全部文字之後，就會感覺到這份與“聯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的刊物的指導思想是混亂的。《準備》在它的創刊號上刊登了一篇記實性政治小說，它被放在首篇的位置，小說的標題也是《準備》。小說

²⁶ “三家村”：“四人幫”對鄧拓、吳晗、廖沫沙的稱謂。“文革”就是以對這三個人的迫害而開始的。

²⁷ 《湘江評論》《火星報》《萊茵報》：北京紅衛兵的鉛印報紙。《湘江評論》出版於海淀區，《火星報》和《萊茵報》出版於西城區和東城區。

以康生等待毛澤東批准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準備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背景素材。小說的作者以細膩的筆調描述了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台的景緻，表明了作者的身份非同一般幹部子弟，作者在小說中藉康生的頭腦所進行的思維和當時官方對搞“文革”的必要性的解釋沒有任何不同。小說用盡美好的辭藻把康生——“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描繪成一位憂國憂民的，與領袖肝膽相照的曠世之才。小說是這樣結束的：通向主席辦公室的紅色電話響了，他（小說一直沒有說出康生的名字）大步跨了過去，拿起電話說：“我是康生”。康生在“文革”初期通過他的老婆曹軼歐組織北大哲學系師生給校黨委貼大字報以撈取政治資本的勾當在當時也不是什麼新聞。康生，被外國人稱為龍爪的人，在紅衛兵的刊物上被噴塗，被神話恰恰說明紅衛兵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決裂只是利益集團之間的爭鬥，而不像有些人自吹的那樣，是兩種思想體系之間的對峙。

在“極右”的紅衛兵思潮之後，“老三屆”中浮現出來的“極左”思潮也同樣沒有掙脫“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羅網。《一切為了“九大”》（上海）、《中國向何處去？》（湖南）、《論新思潮》（北京）、《今日向何方》（廣西）等文章的出現表明，“老三屆”中已經嶄露出現國家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傾向，這個傾向的盡頭就是無遮掩的法西斯主義。它的瘋狂和歇斯底里使“中央文革”都感到恐懼。這種瘋狂也被有些“老三屆”自吹為反“文革”的先知先覺是沒有一點道理的。這種自吹自擂尤其表現在最近國內外出現的一股研究“文革”異端思潮的熱浪中，其作浪者的多數還是文革中的“老三屆”。

醜陋的行為

紅衛兵思潮的出現是一代人思想混亂的總爆發。而思想的混亂一定導致行為的瘋狂。

“八一八”之夜，躁動的紅衛兵為了報答領袖的召見之恩，為了實現建立功勳的夢想，他們迫不及待地向“舊世界”宣戰了。數不清的事例證明，所謂“破四舊”²⁸的鋒芒所向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遺產。多少古蹟被破壞，多少文物被焚毀。不肖子孫進行了一場名副其實的文化革命。這種行為不只是醜惡而是一種罪惡了。

在八月的紅色恐怖中，人們聞到了濃濃的血腥味。殘殺地富反壞右人員及其家屬的事件每天都在發生。

北京六中位於中南海東側、天安門西側、人民大會堂南側。在“紅八月”中，六中紅衛兵在校園裡設立的“刑訊室”曾惡名遠揚。對“階級敵人”捆綁吊打是家常便飯。甚至將滾燙的開水倒在一位 76 歲的老工人的身上，在老人的慘叫聲中紅衛兵們和以魔鬼一樣的嚎笑。

北京東安市場內的吉祥戲院也是歷史的見證：鮮血染紅了舞台，鮮血染紅了幕布。舞台上上演殺人的活劇，舞台下爆發出嗜血者的歡呼。

²⁸ “破四舊”：1966年8月18日北京二中紅衛兵向社會散發、張貼《向舊世界宣戰》的最後通牒的傳單，開始了席捲全國的“破四舊”運動。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報》轉載這份傳單。轉載時，將原文中過分激烈的言辭刪去了。“破四舊”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的簡稱。

首都紅衛兵在大興縣向地富份子及其子弟舉起了屠刀。被殺死的人，最年長的 80 歲高齡，最年幼的僅出生 38 天。被滿門抄斬的有 22 戶人家。

這種殺人的遊戲，以“紅八月”為始端，在不斷升級的階級鬥爭的大背景下愈演愈烈。廣西省出現的“貧下中農最高法庭”公然提出“斬草除根一掃光”的口號，肆意殺戮“四類份子”和他們的後代；湖南省道縣、邵陽縣等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集體屠殺地富及其子女。

打、砸、搶、抄家之風刮遍全國。中國社會的基本人權指數已接近零。住在在協和醫院宿舍的一青年孕婦在“紅八月”被抄家時同時被強姦，施暴者是革軍子弟，年僅 14 歲。如果“文革”博物館真的建立，應為“紅八月”獨闢一個展室，讓後人不要忘記這即醜惡又兇惡的一幕。

如果說製造“紅色恐怖”是少數極端分子的行為，那麼對教師的人身和人格的侵犯則是“老三屆”的群體行為。“老三屆”在“文革”中最先攻擊的對象就是曾在他們身上傾注了大量心血和厚愛的老師。學生對老師的侵犯是全方位的。辱罵，批鬥，毆打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有些學校的“老三屆”甚至將老師活活打死。例如，原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在的實驗中學）的校長卞仲芸女士²⁹就是在本校的操場上被一群十六七歲的女中學生活活打死的。這種學生將老師打死，逼死的現像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事情。許多經歷過“文革”的老教師提起往事仍然不寒而顫。有人說“老三屆”是用狼奶餵大的，這種比喻並不過份。十七年的階級鬥爭教育，不斷進行的對“人性論”的批判使“老三屆”缺少愛心，崇尚獸性。一旦土壤適合，就會開出血淋淋的惡之花。遺憾的是，“文革”過去 32 年了，“老三屆”中沒有人出來認領和懺悔這一份罪惡，向老師們，向死者的家屬，向全社會說一聲對不起。這在道義上是講不過去的！

1998 年夏天，原師大女附中的一位“老三屆”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再次回到北京。和前幾次一樣，她是為在“文革”中被打死的中學老師而來。早在 20 年前，她曾去探望被她的同學打死的老校長的家屬。她是唯一一位來探望死者家屬的師大女附中的學生。10 多年前，她在《女性的野蠻》³⁰一文中再次重提往事，作為圍觀者“我站在操場上，看著這一切。我什麼也沒有做。如果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發生的罪過未加制止，那麼就是罪惡的同謀——但是我在十年之後才學會了這句話”，這是來自老三屆的第一聲懺悔，只是聲音太微弱了。卞校長的死和她沒有任何關係，是什麼東西驅使著她對自己發出如此強烈的自責呢？是一個人的沒有泯滅的良知。說“老三屆”是醜陋的，是因為在“老三屆”中像這樣良知未泯的人實在是太少了。

“老三屆”是共和國的同齡人，歷史卻讓他們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在回憶和共和國共同成長的經歷時，往往使他們的內心產生陣陣的疼痛。他們不能忘卻那如煙的往事，但在公開的場合卻要迴避使自己陷入窘境的話題。歷史是不好隨意塗抹的。“文革”中展現出來

²⁹卞仲芸：抗日戰爭時期在成都“燕京大學”讀書時加入外圍組織。後奔赴解放區。“文革”中以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的身份被本校學生野蠻毒打至死。其骨灰現存放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中。

³⁰《女性的野蠻》：散文集《女博士生手記》中的一篇，文章記述了卞仲芸校長被殘害的經過。作者王友琴，“文革”中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初中學生。

的也並不只是某些個人言和行的醜陋，而是全民族的弱勢和劣根性。消滅這種弱勢，剷除這種劣根性必須從每一個人作起。文過飾非不能根治民族的頑症。

四。請做如是說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老三屆”也不例外。探尋這些代表人物的足跡可以窺見和理順“老三屆”思想的脈絡。這些年來，偶爾也能讀到一些他們回憶往事的文字。但是其中流露出來的懺悔之意不多，炫耀之意不少。最近，我曾從朋友手中得到陳永康（筆名：詠慷）先生的自傳體小說《青春殤》。我抱著極大的興趣，用十個小時，一口氣讀完全書。掩卷之時已是深夜。陳永康先生當年與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同為北京師大附中的學生，因反對工作組名震京城，有“中學蒯大富”之美稱（反工作組的蒯大富與劉少奇的大女兒劉濤同為清華大學的同學）。作者是當年政治漩渦中的人物，他曾因與“中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女兒為政敵而中得“大彩”，今天他卻沒有採用回憶錄的形式，直述當年的往事和今天對那段歷史的在認識，而是採用了小說的形式，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也許有他的難言之隱。而整部小說的文字，以《後記》中的表述最能概括作者對自己，對紅衛兵運動和“老三屆”的評價：“他們虔誠地在信仰的祭壇前奮鬥犧牲，堅韌地在靈魂的煉獄中忍受熬煎，嚮往獻身，期待著歷史的承認。他們火熱的革命熱情，對祖國前途，對人類命運‘舍我其誰’的高度責任感，恐怕會永遠載入史冊，另人感奮。”

“沒有悲劇就沒有悲壯，沒有悲壯就沒有崇高。”

應該坦率地承認，讀到這樣的文字，我失望了，深深地。

“文革”過去三十年了，寫出這樣的文字，能向歷史交代嗎？

不知陳永康先生當年的“戰友”、現居美國的何芳芳女士對“文革”的認識停留在什麼樣的水平上？

我在猜測。

也許，再過一些年，能夠看到以下曾經有著全國影響的“老三屆”或者是他們的親屬寫出的，有著較高境界的文字，一定會感到“非常有趣”（“老三屆”作家王小波的習慣用語）。而另一方面，又很有一些人，一以“成功者”最為典型，無視這些“代表人物”的歷史存在，不承認這些“代表人物”的典型性思維和言行集中反映了那個年代“老三屆”的世界觀的基本輪廓，以證明自己在那場浩劫中做到了潔身無垢。這種辯白實在是多餘。

這些代表人物是：1965年撰寫《獲取5分的“秘訣”》，北大附中“老初三”的學生宮小吉；1966年6月給黨中央寫信主動要求停課鬧革命並自願放棄高考的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的部分“老高三”的學生；1966年六月在清華附中貼出三論《無產階級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的卜大華，駱小海和王銘；1966年8月18日代表北京紅衛兵在天安門

上講話的，北大附中“老高一”學生彭小蒙（女）；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將其名字“彬彬”改為“要武”的，原師大女附中“老高三”學生宋彬彬（女）³¹

1966年9月組織起來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首領，北京四中“老高三”學生孔丹；1966年“八一八”之夜起草《向舊世界宣戰的最後通牒》的，也曾代表首都紅衛兵在天安門上講話的，北京二中“老高三”學生馮曉新；1967年春天，由“中央文革小組”批准成立的“北京中學生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中學紅代會”）領導成員：北京25中“老高三”學生李冬民，北京二中“老高三”學生劉龍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老高三”學生陳永康，清華附中“老高三”學生劉剛（女）；1967年在《四。三戰報》創刊號上撰文《論新思潮》的作者（原良鄉電校學生）

1967年秋天去內蒙牧區插隊的“十男十女”；1968年在湖南因撰寫《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被判有期徒刑10年，原長沙一中“老初一”學生，現在居住在澳洲的楊曦光（現名楊小凱）；“上山下鄉”運動中的全國性標兵：孫立哲（北京），董良鬲（北京），丁愛迪（北京），朱克家（上海、中國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蔡立堅（北京，女，已故）；柴春澤（遼寧）³²

1973年在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的考試中“交白卷”並力呈“知青”現狀的張鐵生（遼寧），精神病患者，朦朧詩開山之作《相信未來》的作者，北京某中學學生郭路生；原北京四中“老高三”學生，朦朧派詩人，現居住在美國的趙振開（筆名北島）

1976年1月在《人民日報》發表長詩《理想之歌》的作者（北京大學中文係部分“工農兵”大學生）；還有：1966年在廣州參加紅衛兵，現居住在美國的王希哲；1966年在“人民大學附中”參加紅衛兵，現居住在美國的魏京生；等等，等等。

五。結束語

有人曾用“青春方程式”³³這種時髦的提法來涵蓋“老三屆”複雜的青年時代。如果一定要用數學語言來描述“老三屆”心路歷程的話，就應該這樣來描述：這個以時間為自變量，表徵人生價值取向的函數不是一條連續曲線。它有著如此多的間斷點而顯得那樣支離破碎。它有著那麼多的拐點，表明它的走向盲目多變，前後不一致，盡顯其價值觀的淺薄和世俗。在它的全部定義域內，只出現過一個絕對值看似輝煌的極大值，遺憾的是它卻落在了負值區間，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又一個的低谷。它不是一條遞增曲線，隨著歲月的流逝可以構造起一個另後人羨慕的人生，積累起比物質財富更具誘惑力的精神財富。在這個人生的坐標系中，徹悟是一條無形的漸近線。逼近它需要時間更需要勇氣：時間用於思考和反省，勇氣用於直面那不堪回首的過去。³⁴

³¹宋彬彬：1966年時，是師大女附中“老高三”的學生。“八一八”那天以首都紅衛兵代表的身份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的袖標。並在1966年8月20日的《光明日報》撰文《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人民日報》第二天全文轉載）。全文見附錄。

³²孫立哲、董良鬲、丁愛迪、朱克家、蔡立堅、柴春澤：均為“上山下鄉”運動中的全國性標兵。他們的“事蹟”均在《人民日報》上進行過宣傳。

³³《青春方程式》：199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知青回憶錄。其中收錄了50位北京女知青的回憶文章。

³⁴“間斷點”、“拐點”、“極大值”、“遞增曲線”、“漸近線”屬於一元微積分“函數”一章中的基本概念。

“老三屆”這三個字本身散發出來的歷史氣息，已不需要在使用它的時候再對其進行任何修飾。這一代人的歷史形象應該定格了。諸多已經被經過反復推敲後使用的定性句語，例如：“獨特的一代”（樂黛雲）³⁵、“最具悲劇色彩，也最為尷尬的一代”（李輝）³⁶、“在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成為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一代”（丁東）³⁷、“在那邪惡與崇高交織時代中所成長起來的‘老三屆’只有他們才在理想境界與創造魄力上與20年代知識分子相匹敵”³⁸等等，都沒有準確地定位歷史上的老三屆。選擇“醜陋的老三屆”這樣一種清晰而簡捷的提法是比較客觀、比較恰如其份的，道理很簡單，因為那個時代是醜陋的。

我曾將本文的初稿念給我剛上高中的兒子聽。念罷，我問兒子作何感想。他沉思片刻，說：“是挺醜陋的。”

低調評價“老三屆”就是要具體地，一點一滴地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為了使這民族的悲醜劇不要再重演。

1998年12月13日初稿，1999年1月1日終稿。原載《黃河》1999年第二期

³⁵摘自樂黛雲為《青春方程式》所寫的“序”。

³⁶摘自李輝的《殘缺的窗欄板》。

³⁷摘自丁冬的《與李輝書——對紅衛兵、老三屆的一些反思》。

³⁸摘自尤西林的《文革境況片段》。